

會員委展發作合濟經際國

十八之刊叢濟經

望 展 濟 經 際 國

版初月一十年十六國民華中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陸元

譯者

高白蕭

吳俊峯

惠男雄

發行者

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臺北市懷寧街一一八號

印刷所

大地印刷廠

三重市福德南路二四巷二號
電話：九七二二四四・九七二二六六

國際經濟展望

目次

摘要	一
導論	五
第一節 國際經濟關係的演變潮流	七
第二節 國際制度的理論與實際	一六
第三節 若干問題：國際行動的準繩	二一
第四節 國內經濟的強化	三二
第五節 國際經濟政策的工作計劃	三七
第六節 談判的新時代	四五

國際經濟展望

——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報告——

本文係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皮特森 (Peter G. Peterson) 所撰，對國際經濟情勢變化之檢討與分析極為詳盡，可以說是美國一九七〇年代國際經濟政策之重要依據，爰加迻譯藉供各方參考。

摘要

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公布的新經濟政策，表明了戰後國際貿易與金融新紀元之開始。過去的時代，雖然在當時是成功的，但其所依據的制度已經不能適應變遷中的世界之需要。此新紀元是以權利與責任之共同分擔為基礎，應能促成一個繁榮與和平的新時代。

本文的目的在說明舊時代及其制度何以必須結束，並且為美國和整個世界人士提出當前工作的綱要，以應付新時代賦予的挑戰和機會。

本文認為，為了形成健全的政策，必須先指出正確問題的所在。舊的政策有一部份是以早期的戰後事實為根據，有時反映出世人未能及時覺察實際變化的發生。過去二十五年來，主要的事實在於美國與其他國家均深信，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競爭能力在國際上俱佔優勢，因之有關國際貿易與支付之制度、規則、與實務，乃以適應此一事實而建立。但是，美國和整個世界均未能及時了解基本結構與競爭力量已經發生變

動；結果，國際政策與實務的反應因而落後。

若干變化擬在以下加以討論，這些變化與若干國家經濟力量之增強有關。特別是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Community）與日本在世界貿易和金融中地位的成長，乃與美國地位的衰退息息相關。我們了解，即使美國經濟在此過程中基本上仍甚堅強，但其國際競爭地位實已日漸式微。原因如下：國際貿易實務與型態改變；農產品貿易與工業產品優惠協定叢生不公平之發展；美國經濟發生基本改變；在美國繼續肩負國際經濟與安全責任時，缺乏彈性的貨幣制度給予美國不合理的負擔。

這些問題顯然是起因於：生產力增進不足，六十年代後半期國內過度通貨膨脹，古典學派國際貨幣與國內調整機能的失效，以及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動。二次世界大戰後創設的國際組織無法應付這些演變，有些國家的政府不願意或者自認不能有效地應付急遽變遷的事實。

演變的情況可由以下種種相互關連的問題獲知：

一、美國與已開發國家的貿易

支持歐洲共同市場的創立和擴大，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里程碑。然而，歐洲共同市場與不願意完全加入此組織之國家締結特殊優惠協定的趨勢，確已改變了世界貿易制度的特性，從無差別待遇為原則改變成透過特殊優惠協定的貿易，後者可能和無差別待遇一樣重要。再者，此過程使世界農產品貿易制度問題更趨複雜，以致市場力量產生嚴重妥協和充滿不公平的現象。

日本已經變成主要貿易國家，其對外貿易的結構、實務的規則、和不均衡的分配，是促成日本國際經濟關係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此種不平衡使美國（在日本貿易型態中大得不成比例）、日本、和其他國家受

到挫折。

美國與加拿大在經濟上的相互影響至爲重大而複雜。兩國經濟相互影響非常廣泛，爲了建立未來的生產力與和諧關係，須有更多的共同行動，以預期和解決共同問題，同時保持各個國家的經濟本色。

二、美國與低度開發國家之貿易

美國與一百個左右低度開發國家的關係，包含貿易與援助之錯綜複雜的相關問題。一致的貿易和投資政策至爲重要。例如，爲了成長，低度開發國家必須出口更多的產品，但這意味着工業國家必須在公平實際的基礎上將其市場開放。

三、美國與共產國家之貿易

由於尼克森總統的開創，美國與共產國家間的關係正在展開，但是金融與有關貿易之其他國際協定尚待完成。同樣地，新的時代需要新的安排。

四、多國性公司與投資政策

多國性公司的成長，代表新挑戰和新機會，人們經常誇言他們所了解的這種新而不尋常的企業。美國需要新的政策，以確保並改善全世界資源利用的天賦本質完全實現，公正有效地處理國際投資可能發生的問題。這些政策主要將與投資管制、稅收、競爭、治外法權、投資者財產移轉和待遇、就業效果、美國外來投資的促進等有關。

五、美國的貿易政策：一個具有更多競爭力量、就業、與自信的美國

爲美國出口尋求更開放與公平的新環境，現有兩種基本選擇。一種爲某些人士所辯護的，建立各種新限制，加強抵制貿易夥伴產品之輸入使現有管制項目日漸增加。然而，這是失敗的處方，也是對於失敗的一種承認。美國偏愛的另一途徑是在需要時正面從事基本性工作，即在競爭日漸增強的世界，改進美國的生產力和競爭能力，掌握原動力以設計立基於美國力量的綜合新方案，鼓勵競爭性之世界交易制度，並對前途充滿信心。

此信心之基礎必須是一強大的國內經濟，其特徵是有助於未來經濟之投資的增加，尤其是新廠房與設備的投資，並且憑藉招致工業技術進步的新方案作爲激勵，此將增進美國的國際競爭能力，幫助社會實現其給予人民較佳生活和生產性工作的承諾。

建立這些方案將基於美國的力量，但是不能漠視由於快速變化和再適應所引起之社會問題。對於工業、勞工、和社團之調整問題，美國需要一綜合的新方法。美國也將需要真實的綜合國家人力方案，確保勞工技藝能够配合經濟社會日益複雜的需要。

爲了保證充分了解新政策的國際利益，美國將亦需要新方案，在機會來臨時協助增加出口機會。此方案可能包含租稅政策、出口融通措施、新的組織概念等等，旨在促使美國在出口拓展方面更具競爭能力。一切努力的關鍵，在於新的立法，俾能賦予美國談判者適當的工具，以建立開放與公平的新世界貿易體系。政府將要求國會密切合作確定談判者的權限。談判者從事國際磋商大業的目標，在於建立新貿易體

系以代替舊體系。

最後一項非常重要的，是國際貨幣制度的改革。大家過去已經努力在許多反常的方式下生存，那種制度假定經濟的變化日益迅速，而匯率却不改變。現在必須修正此一假定，並設計新的貨幣制度。

新制度的特徵，在於至少所有自由世界最強大諸國承諾分享領導權利，共負責任和重擔。新制度將充分了解且奠基於日增的互相依存之事實，與競爭日增的世界經濟，其目標是相互的，共享繁榮而非共享人為與短暫的利益。

以上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尼克森總統為美國和全世界打開的前途。也是一個強大且具有信心的國家，能够致力與盡力為其後代謀求實現的遠景。

導論

尼克森總統於八月十五日公布之新經濟政策，表明了國際經濟關係新紀元的開始；此並非為應付一時危機之暫時反應。新經濟政策顯示各國之間更具彈性、耐力、與活力的經濟關係新時代的開始。過去數年可以說是成功的階段，但其根據的制度已經陳腐不合時宜，而且危機日增。

過去政策所根據的一些重要假設已經不能再適應八月十五日以前的實際情況。八月十五日所採取的國際性措施是就當前事實調整的第一步驟。假若美國總統選擇僅按照眼前的症狀解決危機，則會採取不同的行動。如此一來，世界在將來就會遭遇更多的危機，世界經濟也會落入長期不可避免的不穩定狀態。

取而代之的，美國總統選擇可以保護美國的短期國際地位之措施，這種措施同時也在鼓勵創見，進行國際貨幣與貿易制度以及經濟強國領導權利負擔分配的根本改革。

新經濟政策的緊急特性中，其顯著者爲停止黃金兌換 (gold convertibility) 與課征進口附加稅，二者已成爲國際談判的主題。本文並非陳述此類直接談判，而是說明針對新事實調整的「第二階段」的個人觀點——導引美國通過和超越目前談判之目標與策略的定義。

本文開始首先檢討，過去二十五年適用於此一社會的舊體系需要根本改革的原因。包含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結構與競爭力量之真正變更，以及同樣重要的，就是事實變化與覺察此變化二者之間的差距。

第二節（國際制度：理論與實際）討論發生這些變化之國際貿易和貨幣制度。檢討制度所根據的理論，討論隨變遷而生的實際與理論脫離之各種方式。

第三節（若干問題：國際行動應辦事項）檢討由於覺察變化所引起的一些問題，和眼前待決的應辦事項。此與貿易有關，且就美國的主要國際經濟伙伴一一認定（歐洲、日本、加拿大、低度開發國家、共產國家）。多國性公司出現而引起的問題和一般性投資政策也在此討論。最後，注意一項事實，即當美國邁入新時代時，某些實際問題必須重行評定其價值。

第四節（堅強的國內經濟——爲一堅強及外張的對外經濟政策的基礎）提供國內需要之論點，協助應付當前艱巨的經濟任務。說明在比較開放的世界，美國經濟「競爭能力」的意義爲何，及擬訂聯邦政府領導權力所需之要點大綱，包括新廠房和設備、工藝技術機會、人力訓練需要、未來原料品需要與塑造未來的自覺性努力，而非順從未來所給予的一切。

第五節（國際經濟政策的工作計劃）討論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所積極進行的工作方案。此方案目標是爲總統確定方案原動力的範圍，而此原動力爲有遠見的對外經濟政策所需。包括因應國外競爭而從事國內調整之可行的新計劃；協助掌握新的出口機會；形成一致

與公平的政策和創造合適的國際投資環境；以及向國會提議有關新合法談判權限的議程項目。

最後一節（談判的新時代）討論從事當前談判之必備條件和態度精神。結論時對於透過談判所探求者劃定目標：新的貿易與貨幣協定、以及在未來新年代以分享國際領導權力、共負責任和重擔為特徵之體系。

第一節 國際經濟關係的演變潮流

一、若干新的問題

健全政策的形成必須從正確的問題開始——以當前事實為根據，以未來為目標的問題。

在此演變劇烈的世界，美國走入支持越南的時代，則其未來角色的重要問題必須提出和檢討。國際經濟政策的許多思想和辯護已是舊時代的遺留物。結果，美國不斷地冒險，用舊觀點應付新問題。美國的政府不夠積極，就像任何官僚化政治一樣，經常比較善於修正舊觀點而非思索新問題。亞德萊·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一度說過，國際經濟學最少是需要一些「新的陳腐之言」（new clichés）的學問。今日的問題非常根本，美國需要以一九七〇年代的實際情況為基礎的新政策。

目前實際情況為何？世界經濟與美國地位有何變遷？這些變遷如何影響美國的優先選擇和態度？一九五〇年代國際制度和調整途徑對於一九七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的社會是否足夠？五年前、十年前、或二十年前可以接受的貿易關係在此新經濟社會是否合適與公平？維持必要的國內經濟力量的同時，美國如何能够盡其全力支持發展和平繁榮的世界？

以上是必須提出的一些問題。但是問題之考慮必須超越美國經濟能力之衡量，即使更根本的問題必須

再度檢討。大部份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均受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 和盟國策略的影響，並使之順從，這些策略置安全、軍事、政治目標、冷戰條款於顯著地位，經濟政策則依此類目標擬訂。爲了美國的信心，美國領導和支持其他自由國家的戰後重建。美國如此做，鑒於一個繁榮強大的自由世界對於所有自由國家（包括美國）非常重要。在歐洲，戰爭摧毀的經濟已經修復與重建。五十年代早期，一個統一歐洲的思想開始萌芽。一九六〇年代晚期，歐洲共同市場已經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地區，一九七二年它站在再度擴大的門口，變成一個人口超過美國，國民生產毛額與美國相埒的經濟勢力。

同樣地，美國支持日本的重建。由於獲取迅速經濟利益，其經濟成長較歷史上任何國家更爲快速，一九七〇年的日本已與一九五〇年代早期的日本大相逕庭。世界所得固然增長，世界貿易的成長更爲迅速，尤其對於已開發國家有利，同時在某程度內對於開發中國家亦有裨益。美國正目睹着一些希望實現。

不過，在一切努力之下，美國有兩個基本假設：第一、當其他進步工業國家的經濟逐漸強大時，他們會接受日益增加的責任分攤，以維持自由世界的安全與經濟秩序。第二、隨着經濟力量的增強，美國期望其他國家會逐漸爲全世界的供給者（包括美國）打開市場，這些供給者依存於無差別待遇的世界貿易制度之成長，與立即公平發生必要調整的貨幣制度之支持。

然而，雖然貿易的拓展達到空前水準，隨着時間消逝變得清楚的貿易方式與問題，已不復是一九四〇年代晚期的面貌。全球成長的期望，與另一平行加速指向區域性或國家主義的成見趨勢日漸妥協。對於許多美國人而言，似乎那些曾經從美國得到很多利益的國家，其興趣是日益專注於區域性或國家主義的協定，此種協定經常具有限制性或差別待遇，或兩者兼具。

對於美國人不斷地關懷與慫恿磋商改正此一趨勢，所得到的答案經常是：國內的需要與成見阻止了有

意義的外在調整。它更簡化爲一種反應：延緩談判較之立即談判爲佳。同時美國的外在形勢——日益增加的收支逆差與貿易地位的迅速惡化，使美國日益了解必須反轉這個反應，必須使對方相信，立即談判不僅是值得，而且是必須。

作爲這些新談判的出發點，美國必須認清自己面臨新環境與新問題。美國應如何適應曾經協助建立的新權力均衡？美國不能再假設導致某些國家間比較密切聯繫的每一步驟，也對其餘國家有利。相反地，現在必須自問：在何種情況下，美國應該支持其他國家的經濟結合與優惠關稅？美國競爭地位的含意爲何？美國必須改變何種態度與政策，來保障自己的利益與推進美國總統所稱的「世界利益」？

覺察較事實落後的是下面的觀點：美國國際競爭優勢是不變的事實；美國競爭性利益非常大，與國際伙伴維持彈性及友好關係並且發展繁榮的世界市場時，能够以特別形態輕易承擔各處的讓步。在國內，某些部門因國際競爭產生特殊問題時，美國較少着眼於改進生產力與競爭地位，較多着眼於建立特殊的保護工具。評估美國的國際地位時，對於國內政策及內部力量的強弱點必須提出檢討。美國是否能够假設，正如從前所做的，美國的資源相對地無限豐富？應付對方談判希求時，美國是否有較大的運用餘地？美國是否能够假設：即使競爭對方在經濟、技術、和企業經營方面已較昔日更具競爭能力時，美國即使沒有新政策也能從事有效的競爭？

美國與其他國家已經發現，彼此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與日俱增。貿易、國際銀行業務與資本市場、及對外直接投資迅速成長；國際通訊與運輸工具改進；技術之國際移動已經造成一種境界，使一國的經濟決策經常對其他國家發生重大影響。當政府設法解決內部就業、通貨膨脹、或區域性發展問題時，其結果經常加深其他國家調整的痛苦。當然，政府希望對其國內利益、職責保持最高的主權。但是，主權的適當運

用與保障國內利益，需要各國政府間國際性的努力，以避免各自決策發生衝突的時機之來臨。

七十年代的安定世界，所需要的國際貨幣與貿易制度，是必須能夠提供國際商業與金融穩定與有秩序的條件，並且協調各國政府的決策，使得一國的行動不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經濟困難。同時，也能分派並維持經濟秩序責任給予各經濟強國，並且確保債權國家與債務國家相互盡責。

爲向此一方邁進，需要十年來經濟進步最顯著的各國接受更多責任。雖然美國經濟力量強大，但是不能獨自重行締造國際經濟制度，需要其他國家高度合作。這些國家已經恢復其力量與地位，並且和靈活運用經濟協定有重大利害關係。美國如同自由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曾經從此一制度中獲得裨益。現在責任的重擔命令所有自由世界國家合作，實現適合七十年代實際情況的協定，並分攤此一責任，以避免彼此經濟關係、乃至政治關係之破壞。

二、結構的變化

世人對於美國在全球中的地位與角色的觀念——或許甚至美國自己的觀念，都不曾逐步隨着世界經濟結構之重大變遷而改變。戰爭結束時，未曾受損的美國經濟佔着世界生產能力的顯著比例，美國財政部握有世界一半的貨幣用黃金。無可避免地，美國變成實質資本的首要輸出國，受戰爭破壞國家則利用此種資本以恢復其經濟能力。重建工作在一九五〇年代完成，並爲世界貿易與世界所得立下迅速擴張的根基。結果，每年世界生產毛額在一九七〇年創下新紀錄，約有三萬二千億美元，世界貿易在過去二十年間增加五倍。

雖然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但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差距已經逐漸縮小。一九五〇年，美國

的國民生產毛額佔全世界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四十；今日，僅佔百分之三十。即使在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出口成長率僅及大多數主要貿易伙伴出口成長率之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國民生產毛額差距縮小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國家已在昔日強大基礎上重建起來。其他進步較小國家的成長潛力經常大於美國，因為這些國家可以從事許多追趕工作。但是除開此趨勢是否在未來持續之問題外，美國自己的必備條件非常清楚，美國的經濟必須回到平衡自立成長的速率，以維持生產力的進步，並確保美國經濟在開放貿易制度下保持競爭能力。美國必須如此做，以應付國內社會的需要，同時保持其在世界中的強大地位。

世界貿易的相互依賴程度與日俱增，貿易是各國經濟互相競爭與影響的橋樑。如此，任何國家，尤其在貿易餘額減少時，其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比較中肯的指標，並不是單純的全部出口總額或成長，而是某一特定時間內出口成長率，且與其他先進國家比較，特別是製造業產品的出口成長率。美國應該記住，出口「競爭能力」不僅包括價格競爭能力，同時也包括市場與技術的競爭能力。

比較一九六〇年代十年的出口成長率，結果，美國的情形令人失望（此為時間最近、期間合理、一九六〇年是基期較早年穩定的十年）。這段期間內，美國製造業產品出口增加一·一倍，但是西德增加二倍，日本增加四倍，其他主要工業國家，只有英國出口成長率較美國為低。

導致此種現象的因素很多，包括：國外差別待遇貿易協定的出現、某些國家出口發展方案比美國積極、近年每單位產品勞動成本急速上漲、美國競爭能力顯著惡化。滙率並不反應這些變更。在此期間之內，某些國家採行貨幣貶值或升值。然而貨幣制度的貶值偏差導致美元有效升值，而更加深問題的嚴重性。

美國的貿易相對地位日益衰退，而歐洲共同市場六國和日本獲得最大勝利。歐洲共同市場變成世界上

最大的貿易地區。日本對世界生產與出口所佔比例，在過去二十年內由百分之一增加至百分之六，其國內經濟實質成長率每年超過百分之十，是全世界經濟進步最令人注目的速率。

這些變化並非單純的是成長率之不同。基本上是其他經濟社會中基本產業與複雜產業「能力」的結構變化。例如，歐洲共同市場之鋼鐵生產已經超越美國，日本在一九七五年極有可能超越歐洲與美國。美國在世界汽車市場所佔比率已較幾年前顯著減少。在電子業方面，可以從商業和家庭看見美國地位劇烈變化的證明。一般而言，去年或前年許多主要工業國家，在其製造業部門經歷了「停滯膨脹」(stagflation)，亦即景氣停滯與通貨膨脹結合。停滯膨脹惡化了剩餘生產能力的問題，與加深開拓新市場而不放棄現有市場的動機。這個事實，連結滙率重行調整帶來之貿易關係移轉，能够致使特殊產業或者特殊國家憂慮未來，而較不願意改變現存狀況。

此時，低度開發國家全體生產量佔全世界生產量的比率，稍微增加至百分之十，但以出口而言却見減退(由佔世界出口百分之三十三減至百分之十九)。共產國家集團生產量佔全世界生產量從百分之二三·五稍微增加至百分之二五·五。既然蘇俄與中共的目標在於自給自足，其出口佔世界出口比例僅從百分之四增長至百分之四·九，而且大部分貿易囿於共產世界內進行。

美國本身亦發生重要的結構變化。對外貿易輸出每年均各別超過四百億美元，高於任何國家，過去十年，此成長較全面經濟成長為快，所以出口佔製造業生產比例已從百分之一一·六上漲至百分之一三。進口方面成長更快。

然而，近年來全世界貿易比所得增加更快——平均快二倍。再者，與其他大貿易國家相比，美國的出口佔生產的比率仍小，加拿大為百分之六二，英國為百分之四八，西德為百分之三七，日本為百分之三〇。

。如此，貿易型態的變化對其他國家經濟的影響遠較美國爲深，美國對外貿易問題在政策與政治方面的顯著性遠較其他國家爲小，此點解釋了爲何其他國家數年來對生產者與出口商，提供各種不同幫助以對抗外來壓力，同時說明爲何其他國家爲其貿易利益非常堅定地談判。

一九六〇年代，美國進口成長較出口成長約快百分之二五，進口的迅速增加對於未來經濟至少有三點重要作用：

第一、近來進口已經抵銷了出口超過進口所造成的差距；在一九七一年進口超過出口大約二〇億美元，這是自一八九三年來之第一次。此意謂美國的出口不足以支付美國的進口，結果，美國已經嘗試以金融勞務和移轉（顯著者爲私人國外投資之利潤）來支付進口（匯率之調整會使此點發生重大改變）。

同時發生的是，美國正趨於變成一個漸以服務業爲主的經濟。一九五〇年國民生產中有百分之七〇爲財貨，百分之三〇爲勞務，但是後者到目前已增加至百分之四二。目前約有百分之六〇之勞動在服務業部門，此點已引起某些方面的憂慮，美國將不再是一個重要的製造業經濟國家。

此種憂慮實屬過度誇張。美國的製造業生產值大約爲三千五百億美元，而進口尚不及此數的百分之十。再者，就絕對量言，美國的製造業生產額顯著地超過自由世界若干重要競爭國家國民生產毛額之總和。

雖然如此，美國還是面臨着真正的問題。生產力與穩固的製造業部門競爭能力的需要與日俱增。其次，美國需要給予服務業部門生產力改進的艱巨任務較高的優先性。組成服務業部門的各類服務除了觀光業（最落後產業之一）、金融（利潤優厚但易受攻擊的輸出）、與經營管理（成績很好）以外，較之製造業新產品與原料品缺乏「可貿易性」。

第二、進口之增加不但是受消費者嗜好之影響，而且因爲產業界由國外買進更多原料品。美國不斷增

加原油、鐵礦和銅的進口，且進口大部分或全部的天然橡膠、錫、鎳、鉻質原料。長期預測指出，在西元二〇〇〇年以前美國將需要進口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包括石油之礦產。如此，美國將在世界市場與其他工業國家互相競爭，諸如日本；日本比美國更依賴原料品的進口。

第三、進口增加與美國基本國際收支嚴重損害正好吻合。不過，進口僅是國際收支逆差的一項因素。在國外之軍費支出與私人資本外流的結構也影響收支平衡。收支逆差亦是貨幣與匯率問題，容在以下討論。不論原因為何，過去十年持久的國際收支逆差，與一連串國際貨幣信心的危機嚴重發生，概括了一切對外經濟問題，致使修正成為迫切急務。

美國經濟另一根本演變是近年來的通貨膨脹偏差 (inflationary bias)，對於國際競爭地位和國際收支有深遠的影響。此通貨膨脹趨勢自六十年代中期開始，隨即以顯而易見與危害極深的形勢出現。

工資成本持續上漲的現象並不僅限於美國；它同時出現於所有工業國家，包括日本。但是美國工資上漲率超過生產力的所得增加率，此差額較其他國家為大。結果，工資壓力對於價格水準有顯著的影響，致使美國的出口與歐洲、日本比較時，變得缺乏競爭能力（有些證明指出某些國家能够區別出口價格與國內價格，兩者差距較美國所為者更大。此種「隱藏性傾銷」與服務、製造業與出口的各種混合相對照，其範圍需要更精密的研究）。

除這些因素外，重要而痛苦的事實是，近年來強大的勞工組織已根本改變其國際貿易的政策觀點。憑藉爭論進口取代了美國人的工作，勞工變成了反對國外產品進口的強大保護聲勢。這些勞工亦爭論美國資本出口導致工作機會的減少，對外直接投資必須縮減。這是美國人對內對外經濟政策必須堅信的新政治問題。